

朱熹与

嶽麓書院

楊金鑑著

朱熹与岳麓书院

杨金鑫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凌
封面设计：何铁凡

朱熹与岳麓书院
杨金鑫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湖南师大印刷厂印刷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.25 字数：136千字

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5000本

统一书号：7135·183 定价1.30元

岳麓书院大门



朱文公像



水深辭客仲秋旦稅駕九月
八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終
極雪深路傍泥行漫幾程
雷公背玄惆悵長不浮金誦唐
詩厚意不敢忘爲哭南聲

孔道三年九月八日詩奉酬

致天贈言并以为別

新昌朱志肯

朱熹手书《奉酬故夫贈言并以为別》诗碑

目 录

序	邱汉生 ↑
一 朱熹的生平、学术师承和教育活动	3
(一) 学术师承	3
(二) 教育活动	11
(三) 晚年遭厄运	21
二 朱(熹)、张(栻)岳麓会讲	27
(一) 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发祥地	28
(二) 胡开湘学 朱张继响	35
(三) 论中庸之义和《知言》	44
(四) 朱、张岳麓会讲的影响	65
三 朱熹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	72
(一) 任命经过	72
(二) 主要政绩	74
四 朱熹兴学岳麓更建书院	88
(一) 兴学岳麓	89
(二) 更建书院	97
(三) 朱熹对书院发展的影响	103
附录一 岳麓书院兴废年表	111

五 朱熹在潭州岳麓的遗迹	116
(一) 遗址	117
(二) 墓迹	124
六 朱熹在潭州岳麓的门人和著书叙述朱学的湘人	132
(一) 门人概况	133
(二) 潭州岳麓的门人	135
(三) 著书叙述朱学的湘人	147
附录二 宋代湖南的书院	151
附录三 本书所引主要书目	161
后记	163

序

邱汉生

杨君金鑫著《朱熹与岳麓书院》，书成，浼陈谷嘉同志问序于余。谷嘉固今日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。昔贤今彦，后先辉映，令人叹美。而余固陋，又何足以序杨君之书？

读杨君书之纲要，论朱熹的生平与学术；论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共同讲学；论朱熹知潭州日兴学岳麓，更建书院；述朱熹在潭州岳麓的遗迹；述朱熹在潭州岳麓的门人。观其纲要，可知杨君书十分美备。杨君研究朱熹著作，又从地方志中钩稽材料，著为此书，用力甚勤。余固信杨君之书为有价值著作无疑。尚论古人，兼及书院的作用，诚然对我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是一种贡献。

南宋时期，朱、张、吕三贤，最为人称道。三人交谊甚笃，切磋学术，磨砻道义，相得益彰，与江西顿悟、永康事功，固有不同。张、吕早逝，朱熹很感痛伤。今观朱熹著作，所受二人影响甚明。《近思录》为朱、吕同辑。而朱熹对太极的理解，对中和说的修正，均受张栻的影响。至于《敬斋箴》之追踪张栻的《主一箴》尤为明显。可见朱熹的本体论（太极说），心性论（中和说），道德修养论（持敬说），均参考了张栻之说。这是研究宋明理学史的学人应该注意的。

孝宗乾道三年，朱熹去潭州访问张栻，遂同在岳麓书院讲学。朱熹此行，有学生随侍。一路所经，皆赋诗纪之。到潭州以后，与张栻往还，登山临水，亦皆有诗。检朱熹文集，可以知

之。而在岳麓书院讲学，为此行之结果，亦此行之高峰。朱熹的太极说、中和说所受张栻的影响，即在此时。故此行不仅表明朱、张的深厚友谊，尤足以见两人在理学思想上的契合。往年我在长沙，访岳麓书院，见院宇宏敞，讲堂崇严，抚摸朱熹所书擘窠大字，严毅端方，一如其人。缅怀先贤，尤思张栻之为人峻洁，低徊不能去。遂赋诗抒怀。诗云：

理学危疑震撼时，朱张讲论下书帷。

胸中太极初文就，笔底中和旧说非。

诗就是讲到朱熹太极说与中和说接受了张栻的影响。而此次讲学对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诗中亦兼及之。

去秋，我应邀在岳麓书院讲宋明理学史，诸生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河南、湖南，人虽不多，而皆潜心听讲，笃志钻研，令人欣慰。一日，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陈海波同志伴我游桔子洲，至湘水之滨，指谓余曰：此为朱张渡，朱熹、张栻当年往还渡湘江之处，后人念之不忘。昔贤遗迹，千载犹香。我中华民族，文化之深厚于此可见，固不仅二千数百年前的屈贾高风令人瞻仰无既而已。今日对宋明理学深入研究，撷其菁英，弃其糠秕，亦未始非建设精神文明之一助。

岳麓书院建于北宋，今年为一千〇一十周年纪念。千年学府，人材蔚起。湖南大学实承书院的统绪，作育之功，尤为可观，则书院今后的工作更大有可为。讲学研究，培养高级学术人才，行见对文化的建设将作出有益的贡献。

序杨君之书，因论朱、张讲学，用以覩杨君书的学术意义。并祝岳麓书院千年纪念之盛为世界教育史上所仅见，当亦方驾乎彼牛津、剑桥而无愧色了。

一九八六年五月，谨序于北京景山寓斋。

一 朱熹的生平、学术师承 和教育活动

朱熹(1130——1200年)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，是理学的集大成者。字元晦，一字仲庵，号晦庵，别称紫阳，卒谥文，爵封为公，世称朱文公。原籍江南徽州府婺源县(今属江西省)。宋高宗建炎四年(1130年)九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南剑州尤溪县，长于建州建瓯，成家于崇安县五夫里，立业于建阳考亭，后以考亭称朱熹。考亭为其讲学之所，故后世称其学派为考亭学派。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福建各地学习、著述和讲学，故后人有称朱熹为闽人的，其学说称为闽学派。

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，并更建书院，建树颇多，留下的遗迹不少。特别是宋孝宗乾道三年(1167年)朱熹至潭州(今长沙市)访问著名理学家张栻，在岳麓书院讲学，从而使岳麓书院出现鼎盛时期。“胡开潭学，宋张继响”，^①影响极大。为了更好地了解朱熹，我们将首先研究他的学术师承、教育活动和晚年的遭遇。

(一) 学术师承

朱熹学有师承，幼年受学于家庭，深受其父亲的影响，既长遵父命从学于胡宪、刘勉之、刘子翬，后来又拜李侗为师。

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学习。朱松(1097——1143年)，字乔年，号韦斋，追谥“献清公”。北宋徽宗政和八年(1118年)，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。由于他为人刚直，不肯附

^①光绪《湘潭县志》卷八。

和当时秦桧的和议政策，因而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被派到福建任建州政和县尉（掌一县治安）。当时朱松以家乡社会秩序不平靖，遂典押祖遗产业，奉父朱森（1076——1125年）携妻挈家同来建州赴任。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三、四月间（五月改元建炎），朱松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。离职后，寓在尤溪郑义斋宅。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九月十五日午时，朱熹就出生在这里。可以说，朱熹与南宋朝廷一道诞生。南宋初年正值战火纷飞，金军不断南侵，广大人民奋起抗金的时期，这不能不给朱熹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影响。

朱松师事罗从彦，与李侗为同学，而罗从彦又是杨龟山（时）的门人，因此朱松“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，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，于是益自刻厉，痛刮浮华，以趋本实。”“因取古人佩韦之义，以名其斋，早夜其间，以自警。”①河洛之学，即二程（颢、颐）学说。朱熹幼年就在父亲的直接教育下，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，自称“家贫儿痴但深藏，五年不出门庭荒。”②他少年就“心好”儒家之学，“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，闻河洛之学，推明圣贤遗意，日诵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。先生早岁已知其说，而心好之。”③朱熹说：“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。”“虽以熹之不敏，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。”④因此，朱熹的家学，由罗从彦、杨时，溯其源于二程。

绍兴十三年（1143年）朱熹十四岁，朱松就于三月二十四日

①《朱公（松）行状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九十七。以下简称《文集》。

②《寿母生朝》，《文集》卷二。

③《朱子行状》。以下简称《行状》。

④《大学章句序》，《文集》卷七十六。

卒于建州城南环溪精舍。当时朱熹的家境并不宽裕，他祖父朱森卒于福建政和县，“贫不能归葬，即葬其邑。”①《宋史·朱熹传》说：“家故贫，……簞瓢屡空，晏如也。”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。他五岁上学时，朱松在《送五二郎读书诗》中说：“故乡无厚业，旧篋有残书。”他“少好古金石文字，家贫不能有其书。”②因此自称“草茅贱士”，③“熹本以贱贫应举于禄。”④他“致仕家贫，故诸生自远而至者，豆饭藜羹，率与之共，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，非其道则一介弗取也。”⑤朱熹少年丧父时，生活无依靠。朱松病危时，将家事托付给当时右朝议大夫刘子羽，并对朱熹说：“籍溪胡原仲（宪）、白水刘致中（勉之）、屏山刘彦仲（子翬），此三人者，吾友也。其学皆有渊源，吾所敬畏。吾即死，汝往父事之，而惟其言之听，则吾死不恨矣。”⑥

朱松死后，朱熹便遵父命，受学于三先生之门。当时刘彦仲与其兄刘子羽（1093——1142年）在其家乡崇安县五夫里纱帽山下、潭溪之上，筑室五间，扁其厅事曰：“紫阳书堂。”寝堂曰韦斋，以父意命名。室曰晦堂，曰敬斋，曰义斋。刘子羽《与刘致中》书云：“于绯溪得屋五间，器用完备，又于七仑前得地，可以树，有圃可蔬，有池可鱼，朱家人口不多，可以居。”⑦朱熹与其母祝氏孺人（1100——1169年）于绍兴十四年（1144年）迁居之，居此几五十年始移居考亭。朱熹回忆说：“先君卒，熹年才十有四，孺人辛勤抚养，俾知所向。不幸既长而愚，不適世

①《宋元学案·豫章学案》。以下只引篇名。

②《家藏石刻序》，《文集》卷七十五。

③《辞免秘书郎状二》，《文集》卷二十二。

④《辞免秘阁修撰状二》，《文集》卷二十二。

⑤《行状》

⑥《屏山先生刘公墓表》，《文集》卷九十。

⑦《鹤林玉露》卷二甲编。

用，贫病困蹙，人所不堪，而孺人处之怡然。”①当时三先生亦抚养朱熹如子侄，而刘致中因以其女妻之。不数年，二刘相继去世，独事胡原仲最久。

胡、刘三先生都是罗从彦的学生，均宗二程之学，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。他们都以洛学兼明佛老，“三家之学略同，然似皆不能不杂于禅。”②籍溪胡原仲（1084—1162年），名宪，胡安国之侄，稍长从胡安国学，始闻河南程氏之说。“初与白水同隐，又与刘屏山、朱韦斋交。”③“论天下事慨洒，为建州教授，诏告诸生以古人为己之学。”朱熹说：“籍溪旧开药店，胡居士熟药。”籍溪厅上大榜曰：文定书堂。他闻常人有片言之善，无不从容咨叩，必竭两端而后已，因此教“诸生于功课余暇，以片纸书古人懿行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，粘置壁间，俾往来诵之，咸令精熟。”“胡籍溪人物好沈静谨严，只是讲学不透。”④朱熹为之作《籍溪先生胡公行状》。刘致中（1091—1149年），字勉之，号白水，亦号草堂，崇安人。二程弟子杨时的门人，“学《易》于樵天授，已而见刘元城、杨龟山，皆请业焉。”⑤“自幼强学，日诵数千言，耳目所接，一过不复忘。”乱后故山室庐荒顿，“乃即建阳近郊，肖屯别墅，结草为堂，读书其中，力耕稼以自给。澹若无求于世，而一时贤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。”⑥朱熹称其随材施教，娓娓无倦色，自壮至老如一日也。刘彦仲（1101—1147年），名子翬，自号病翁，刘子羽之弟，因里居屏山（即纱帽山）下，故称为屏山先生。

①《尚书吏部员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圹志》，《文集》卷九十四。

②《刘胡诸儒学案》。

③《宋元学案补遗·序录》。以下只引篇名。

④《语类》卷一〇一。

⑤《补遗·序录》。

⑥《聘士刘公先生墓表》，《文集》卷九十。

刘屏山以父任授承务郎，以疾辞归，在武夷山主管冲佑观，隐居山林研究学问达十七年之久，其学尤深于《易》。“与胡原仲、刘致中为道义交，天资卓异，而属意高深，与人交谈而耐久。朱文公称其文辞之伟，足以惊一世；精微之学，静退之风，足以发蒙蔽，所著有《屏山集》二十卷。”①《宋史·刘子翬传》说：“子翬少喜佛氏说，归而读《易》，即涣然有得。其说以为学《易》当先《复》，故以是告熏焉。”朱熹“一日请问先生平昔入道次第。先生欣然告之曰：吾少未闻道，官莆田时，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，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，而心悦之，以为道在是矣。比归读吾书，而有契焉。然后知吾道之大，其体用之全乃如此。抑吾于《易》，得入德之门焉。”②朱熹从十五岁至十七岁的两年中，大部分时间跟随刘屏山学习，“朝夕于之侧”，“顿首受教。”

他们三人以洛学兼明佛老，对朱熹有深刻影响。于是朱熹以“慨然有求道之志，博求之经传，遍求当世有识之士，虽释老之学，亦必究其归趣，订其是非。”③一方面，他以学习儒家重要经典为主，“十五、六时读《中庸》”，“十七、八岁读《孟子》”，“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，凡三、四夜，穷究到明。”④“熹少年好读程氏书，年二十许时，始得西山先生所著《论》、《孟》诸说读之，又知龟山之学横出此枝，而恨不及见也。”⑤另一方面，“熹于释氏之说，盖尝师其人、尊其道，求之亦切至矣。”⑥“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。”⑦他说：“某十五、六岁时，亦尝留心于

①《宋元学案补遗·序录》。

②《屏山先生刘公墓表》，《文集》卷九十。

③《行状》。④《语类》卷一〇四。

⑤《答李浜老》，《文集》卷四十六。

⑥《答汪尚书之二》，《文集》卷三十。

⑦《答江元适》，《文集》卷三十八。

禅”，“某旧时，亦要无所不学，禅、道、文章、楚辞、诗、兵法，事事要学。”①“禅”指的是佛学，“老”指的是老、庄。可见，朱熹早年之学，盖自驳杂中来，而尤洞究释氏之旨。《宋元学案·东发学案》云：“二程既歿，门人弟子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，虽晦庵朱先生初年亦几陷焉。”

由于家学的薰陶，早年又受学于刘、胡三人，加上朱熹刻苦学习，“自十六、七岁时，下功夫读书，彼时四旁皆无津涯，只自凭地硬著力去做，至今日虽不足道，但当时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读了书。”②因此，他青年时代在学术上便有所成就。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登进士第，三年后被授予左迪功郎。

朱熹虽然从学刘、胡三先生，但所得甚浅，并不满足，其后屏山先生亡，籍溪在，朱熹得见于此道未有所得，乃见延平。延平即李侗（1093——1163年），字愿中，学者称延平先生，福建南剑州剑浦（今福建南平市）人。杨时倡道东南，游其门旨极者，惟罗从彦一人。李侗二十四岁时，受学于罗从彦之门，尽得其“所传之奥”，同门皆以为不及。退而屏居山田，结茅水竹之间，谢绝世故四十余年。朱熹说：“李丈名侗，师事罗仲素先生。罗尝见伊川，后卒业龟山之门，深见称许，其弃后学久矣。李丈独深得其阃奥，经学纯明，涵养精粹，延平士人甚尊事之，请以为郡学正。虽不复应举，而温谦慤厚，人与之处，久而不见其涯，郁然君子人也。先子（即朱松）与之游数十年，道谊之契甚深。”③其学主“默坐澄心，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。”肯定儒学与佛道等“异端”的不同，在于掌握“理一分殊”之旨。李侗没有留下著作，仅有朱熹所编《延平问答》二卷。

①②《语类》卷一〇四。

③《与范直阁》，《文集》卷三十七。

朱熹自二十四岁至三十四岁，十年之间，四次见李侗。第一次是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年）夏，李侗六十岁，朱熹二十四岁，将上任同安，以父辈师事于李侗之门；第二次是二十八年（1158年）春正月，李侗六十六岁，朱熹二十九岁，同安官后徒步数百里，见李侗于延平；第三次是三十年（1160年）冬，李侗六十八岁，朱熹三十岁，再见李侗于延平，退而寓于西林院惟可师之舍，朝夕往返受教，得理一分殊之旨，往往阅数月而去；第四次是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春，李侗七十岁，朱熹三十三岁，复拜李侗于建安，遂与俱归延平，复寓西林数月。①自朱熹获从李侗游，每一去而复来，并经常有书信求教，论辩往复，“所闻必益超绝，盖其上达不已，日新如此。”②开初，朱熹从学李侗时，好为儻侗之言，因此李侗因病发药，“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门，务为儻侗宏阔之言，好同而恶异，喜大而耻小。延平皆不之许，既而言曰：吾儒之学，所以异于异端者，理一而分殊也。理不患其不一，所患者分殊耳。朱子感其言，故其精察妙契，著书立言，莫不由此。”③朱熹接受李侗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：第一是理一分殊，第二是静坐默想工夫。他受学李侗后，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朱熹说：某少时未有知，亦曾学禅，初见李侗时，亦以禅学请教，李侗极言其不是。又说：“李先生为人简重，却是不甚会说，只教看圣贤言语。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，意中道禅亦自在，且将圣人书来读，读来读去，一日复一日，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，却回头看释氏之说，渐渐破绽、罅漏百出。”“李先生令去圣经中求义，某后刻意经学，推见实理，始信前日诸

①《题西林可师达观轩》，《文集》卷二。

②《延平先生李公行状》，《文集》卷九十七。

③《北山四先生学案》。

人（好佛老）之误。”①经过李侗的教育，朱熹不仅认识到过去所学佛教禅学思想漏洞百出，而且更体会到“吾儒广大精微，本末备具，不必它求，”②因而便致力于所谓切实工夫。这不能不说这是朱熹学术思想上的重要转变。自此以后，朱熹专心儒学，而求义理，往往彻夜不寐，直至把义理穷究透彻为止。从而得到李侗的称赞：“此人极颖悟，力行可畏，讲学极造其微处”；“进学甚力，乐善畏义，吾党鲜有。”“此人别无他事，一味潜心于此。初讲学时，颇为道理所缚，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，一意下功夫。若于此渐熟，则体用合矣。”③这样，朱熹便通过李侗这样一个重要环节，继承了二程学说的正统，并吸收、融合了佛教的思想方法和道教的自然发展观，集理学之大成，从而成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人物。

朱熹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受李侗的薰陶，而且在政治上亦受其影响。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六月，孝宗即位，诏求直言，朱熹受诏到京城临安向孝宗皇帝奏事。临行前，以封事质正于李侗，李侗答曰：“今日所以不振，立志不定，事功不成者，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。”八月，朱熹以监潭州南岳庙的臣职向孝宗上《封事》，即《壬午应诏封事》，就是按照老师的意旨陈述政见的。兴隆元年（1163年）十一月六日，朱熹受诏垂拱殿奏事，“文公将赴召，问所宣言于先生（李侗）。先生（李侗）答以三纲不振，义利不分，人只趋利而不顾义，故主势孤。朱子首用其说以对。”④朱熹三次《癸未垂拱奏扎》，“所陈不出《封事》之意，而加剀切焉。”⑤事后朱熹说：“熹六日登封。初读

①《语类》卷一〇四。

②《语类》卷一二六。

③《与罗博文书》，《李延平集》卷一。

④毛念恃：《延平先生年谱》。

⑤《行状》。